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逻辑、历程与启示

王敏^{1,2}, 汪勇^{2*}

(1.衡阳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2; 2.贵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1)

摘要: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并大力推行制度治党。因为制度治党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元逻辑”遵循,也是现代政治发展与政党治理制度化的“功能逻辑”表达。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先后走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孕育与萌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开端与探索、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起步与型构、新时代的发展与完善的艰辛历程。这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化推进提供了镜鉴启示,那就是必须坚持守正创新理念,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原则,必须坚持中国问题导向,让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辉映伟大新时代。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制度治党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21)03-0001-08

Logic, process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institutional governance of the CPC over the party in the past century

WANG Min^{1,2}, WANG Yong^{2*}

(1.School of Marxism,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421002, China; 2.School of Marxism,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past century has witnesse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s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arty governance with institution and vigorous implementation. Because institutional party governance not only follows the "meta logic" of Marxist party construction, but also manifests the "functional logic" of modern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arty governance. Over the past hundred years, the party governance with institution of the CPC has gone through an arduous journey from the gestation and germination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to the beginning and exploration of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from the start and configura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he new period to the improvement and perfection in the new era. This provides some insight into and enlightenment for promoting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exercising full and strict governance over Party in the new era: the concept of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must be upheld, the principle of Party's leadership and the orientation of China's issues must be adhered to so as to make the CPC's institutional governance over the Party shine the great new era.

Keywor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entenary of the founding of CPC; party governance with institutions

作为当今中国的执政党和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所走过的百年历程,是一个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由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由革命到建设再到改革的艰难曲折的光辉历程。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百年历程,就是一段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不断重视和加

强制度治党的百年历程。鉴于目前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制度治党历史进行研究的文献还不多见,笔者拟以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立论逻辑与初心规定为起点,系统回顾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百年历程,科学总结制度治党的历史经验,以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化,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局面,从而为实现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更坚实的政治基础和制度保障。

一、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立论逻辑

作为政党治理范畴的重要概念,制度治党与党

收稿日期: 2021-05-06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0YJC710060)

作者简介: 王敏(1982—),男,湖南衡阳人,衡阳师范学院讲师,贵州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与党的建设。*为通信作者。

的制度建设密切相关但又与之明显不同。如果说,党的制度建设主要侧重于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建构与完善,那么,制度治党则更多强调的是运用制度手段对党组织内部事务、党组织成员行为、党组织内部政治生活、党组织与外部关系等进行管理和约束的治理形态。党的制度建设的目的是制度治党,制度治党依赖于党的制度建设。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的百年来,高度重视党的制度建设,十分推崇制度治党,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元逻辑”之遵循,也是现代政治发展与政党治理制度化“功能逻辑”之所在。

1. 制度治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元逻辑”遵循

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具有明确目标性、高度组织性和严格纪律性,并迥异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或政治组织的工人阶级政党,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元逻辑”就是维护政党自身的先进性和人民性、组织力和战斗力。由于制度治党能有效地维护和体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与使命追求,因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元逻辑”的一般要求与基本遵循。

(1) 马克思主义政党依靠制度治党来保证其先进性和人民性。先进性和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其他一般政党或政治组织的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组织,是无产阶级‘最先进的和最坚决的’部分。”^[1]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同盟章程》第二条中对入党条件做了严格的规定,以保证“共产党人是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最不知疲倦的、无所畏惧的和可靠的先进战士’,是‘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是最勇敢的士兵’”^[1]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特质。就人民性而言,“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2],共产党“是能够经常同群众保持真正的联系的党,善于领导这些群众的党”^[3],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成立共产党的初衷,就是要让“全世界受苦的人”做天下的主人。为实现党的人民性宗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提出或践行“确保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维护的集体领导制以及代表大会制”^[4]、党内民主制

度等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组织运行制度,提出或践行加强权力监督的党内监督制度及问责“介绍人”机制等相关制度。

(2) 马克思主义政党依靠制度治党来保证其组织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共产党,从其诞生之初就确立要创造一个“自由人联合体”^[5]的全新社会之理想目标。正是这种组织使命的崇高性与明确目标性,让马克思主义政党同以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权威为核心的制度治党紧密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权威,才能保证党的制度执行力,只有实行制度治党,才能提高党的组织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为此,马克思指出,要“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6]。恩格斯也提出:“没有任何党的纪律……我们会得到一个早期基督教徒那样的畏缩胆怯的而又阿谀奉承的组织。”^[7]列宁还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8]“谁要是把无产阶级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在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8]所以,高度严格的组织纪律性与权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建设的根本要求与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实行制度治党的价值旨归,也是有效提高党的组织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理论规定与制度保障。

2. 制度治党是现代政治发展与政党治理制度化的“功能逻辑”表达

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任何政党或政治组织为了维护本组织的生存与发展,都必须借助法规制度体系的功能作用来予以规范和调节、治理和保障。或者说,制度治党是现代政治发展与政党治理制度化的“功能逻辑”表达。

(1) 制度治党是现代政治发展与政党制度化建设的显著功能特征。现代政治都是政党政治,与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马克斯·韦伯在论及政党与制度间关系时指出:“只有在拥有某种理性的制度和—一个准备执行制度的人员机构共同体之内,才有可能形成政党。”^[9]塞缪尔·亨廷顿在其经典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划分了政党发展的“宗派期、两极化、扩展期、制度化”^[10]四个阶段,其中制度化阶段是政党发展的成熟期,是“政党组

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与稳定性的一种进程”^[10]。换言之，所谓政党发展的制度化阶段，其实就是指政党权力及政党组织行为必须由法律法规及相关规章制度来加以调节、规范和约束的阶段。正因为政党的制度化水平直接关系到政党组织自身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持久性和稳定性，特别是对于执政党而言，执政党的制度化水平更是关系到其执政地位的稳固性与领导方式的合法性。为此，世界上的很多国家“为了加强政党制度化建设，纷纷加强政党立法，有些国家如德国、俄罗斯等，甚至专门制定了《政党法》”^[11]，其目的就是为了通过正当的法律制度规范来全面规约政党权力及政党组织行为。

(2) 制度治党是政党实现自我调适和贯彻政党治理底线思维的重要方式。所谓政党调适 (Party Adaptability)，主要是指政党在政治发展过程中为应对外部政治环境变化、防范和应对政治风险和挑战，以制度化的规定和安排而做出的适应性调整的过程。在许多西方政治学家看来，政党调适的主要依据是休谟的“无赖原则”，目标指向是制度治党。“无赖原则”认为：“在设计制度时必须把每个人都当作无赖，这是一条正当的政治准则。”^[12]“既然所有的政治家和政治行动者都可能成为无赖，就必须对他们有制约。”^[12]也正是因为“休谟在普遍无赖的假定中采纳的是最坏情形的策略，故而，休谟式的制度安排在面临最坏的挑战时也能平安度过”^[12]。显然，基于休谟“无赖假设”的政党调适与制度设计，制度治党是从政党组织成员这一人格化主体视角切入治党管党的底线要求及其必要性，主要表征为政党组织通过制度化方式和手段不断增强自身的环境适应能力与风险抵抗能力的自主调整、主动应变的过程。

二、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百年历程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自 1921 年诞生后，就自觉地传承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治党的政党基因，进行制度治党的相关探索与尝试，先后走过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制度治党之路，期间偶有曲折停滞，但其不断发展演进的历史线条也十分清晰。

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孕育与萌芽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

是团结领导全国人民完成救亡图存和实现人民解放的社会革命，革命方式主要是开展军事斗争。又由于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包括党的制度建设在内的党的总体建设都还处于孕育和萌芽阶段，所以这一历史时期的制度治党主要表现在总体层面的章程或纲领规定和聚焦军事斗争的具体纪律制定与党规文件约束。

(1) “总体制度”的初步探索与形成。党的“一大”通过了具有党章初步体例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明确规定党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并对党员发展条件作了初步规定，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正式孕育。党的“二大”制定出台《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入党条件与程序、党的组织系统和组织纪律及其他制度等都做了详细规定。1938 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党规”概念：“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必须制定一种较为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13]

(2) “具体制度”的相继出台与执行。在制度制定上，先是“三湾改编”确立的“党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创造，后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制度规定，再到六届六中全会制定并通过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等多项党内法规，规范了党内政治生活，推进了党的制度化建设。在制度执行上，强调纪律和制度的严格性与严肃性，如延安时期的黄克功案件是中国共产党从严执行治党制度的典型实例，为的是保证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能够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的程度”^[14]，从而“避免个别人破坏党的团结与统一”^[14]。

概言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开展革命实践与军事斗争中大力推进的系列制度治党的尝试与举措，大大提高了党的组织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2.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开端与探索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由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历史性转变，由领导军事斗争为主到领导国家建设为主的目标任务转

变,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在这一阶段呈现出全新开端与曲折探索的历史特点。

(1) 开启了纪检监察制度正规化建设之路。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不仅面对着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历史重任,也面对着全国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人数急剧增加的客观事实,还面对着历史发展周期律的“窑洞之问”,因而就特别重视党内监督和纪律检查制度的作用,首次明确提出了“更重要的是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做出适当规定,以便对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监督”^[15]的话语要求。《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1949)》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细则(1949)》的印发,正式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推动全国性的纪检监察与制度治党工作的历史开端。

(2) 全国性管党治党制度规范陆续出台与推进。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与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实现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在此背景下,党的建设也开始从过去以制度建设促思想建设服务于军事斗争,转变为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并重共同服务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时代任务。具体表现在:一方面,这一时期陆续出台的全国性管党治党系列制度,对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党如何执政强党兴国的的问题进行了艰辛的制度化探索。另一方面,对民主集中制这个党的根本组织原则进行了发展与完善,如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修改稿)就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扩大党内民主的要求,强调由过去过于注重‘集中’转到更为注重“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15]的领导体制改革的路向。此外,还出台了关涉党员干部教育管理工作的许多具体制度化规定,如提出“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并探索出了一套识别、使用、爱护和团结干部的政策、党员干部学习教育制度、调查研究制度、党员干部轮训制度、党校工作制度以及党员干部考核制度。

诚如上述,中国共产党不仅通过建章立制确保了党对国家的全面领导,而且确保了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建设。但由于党的执政角色适应问题及党和国家建设日趋严重的泛政治化倾向的问题,一些好的制度并未真正得到落实,制度治党在良好开端后

又呈现出曲折停滞的局面。

3.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起步与型构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翻开了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篇章。中国共产党面对这一历史新时期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让“制度是决定因素”^[16]的制度治党思想嵌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党治国理政与谋篇布局的全过程,推动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快速起步并渐趋定型化。

(1) 突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新时期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破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提出。鉴于以往的历史深刻教训,邓小平特别强调:“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16]1982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明确规定要“有系统地建立健全老干部离休退休和退居二线的制度,使之经常化,并且严格地加以实行”^[17]。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和党的十六大等多次会议,先后对党的领导体制进行改革与完善,并践行着党的领导交接班制度。二是加强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邓小平针对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的深刻变化和社会关系的复杂调整,认为要“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18]。此后,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的领导体制、工作方式、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改革与改进,使得党的领导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和定型。

(2) 重点强化和严格党的纪检监察制度。邓小平在建立健全党的监督制度方面,提出要建立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制定和颁布一系列党的监督检察制度和纪律处分条例,实行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方式,对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实行监督。此后,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注重制度建设……进一步建立科学的规章制度,形成适应新的历史时期所要求的新机制新规范”^[19]的制度治党理念,落实从严治党要求,大力加强反腐败斗争,建立了以权力监督为主线的党内监督体制。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重视党的制度建设与其他各方面建设的密切关系,将“制度化”思想贯穿融入其他各方面建设之中;同

时引入依法治国理念,将“法治化”思想对接渗透到管党治党实践中,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

(3) 党内法规制度的体系化型构。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了“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16]的观点,特别强调了以党章为根本的党内法规制度对于党和国家的极端重要性。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先是与时俱进地对党章进行了修订,然后围绕《党章》的原则基础和“民主集中制”的核心地位,“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16],先后对党的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党内生活制度、党委会工作制度、干部管理制度等进行改革与完善。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党所面临的新形势,不断补齐原有的党员领导干部选拔体制机制上的制度短板与制度漏洞,制定党内选人用人制度、党内教育和管理及监督制度、党内通报制度和党的干部民主评议制度等。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推进党内民主决策机制、开启党务公开制度、完善干部管理与选拔任用制度等制度创新与体系型构等方面进行了不懈探索。

4.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发展与完善

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深入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化并走向纵深,首次明确提出“制度治党”的科学概念,要求“全方位扎紧制度笼子,更多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20],进一步推动和促进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发展与完善。

(1) 新时代治党管党的“制度笼子”扎得更牢。十八大以来,党在加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的“立改废”上花了大力气,从而推动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制度化、科学化建设。一是以“立”补空白,从战略高度对新时代制度治党做了顶层设计和系统安排,搭建了新时代“1+4”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新框架;二是以“改”来完善,因应新时代发展变化对一些党内法规及其不合时宜的条款进行了全面修订与调整完善,从而极大地解决部分法规落后于党的建设发展的问题;三是以“废”清地基,对建党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 70 年来制定颁

布的党内法规制度进行了批次化和系统化清理,“共梳理出规范党组织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1178 件,其中废止 322 件、宣布失效 369 件、继续有效 487 件”^[21]。这为增强新时代制度治党的有效性提供了强大制度保障。

(2) 新时代治党管党的“制度意识”立得更严。制度治党,不仅需要完善的法规制度可依可循,也需要广大党员干部养成“守纪律、明规矩、崇法制”的制度意识。十八大以来,党高度重视制度因素对党和国家的重要作用,并将制度规矩意识立在党的建设中更为突出的位置。2014 年,习近平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制度不少,可以说基本形成,但不要让它们形同虚设,成为‘稻草人’,形成‘破窗效应’。很多情况没有得到有效监督,违反了也没有任何处理。这样搞,谁会把制度当回事呢?”^[20]为此,习近平反复强调必须严明党的规章制度,牢固树立制度意识,让纪律规矩和法规制度落地生根,用刚性的纪律规矩和法规制度管住全体党员,实施全面从严治党。党中央先后出台一系列关于“守纪明规崇法”的制度化、规范化的政策法规文件及相关举措,让新时代管党治党的“制度意识”大旗高高立起,成效也十分明显。

(3) 新时代治党管党的“关键少数”盯得更紧。制度之要,在于执行。制度执行之要,在于以上率下,在于“关键少数”的率先垂范。2013 年,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从严管理的要求能不能落到实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非常重要。”^[20]2016 年,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新修订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两个文件,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接受各方面监督”^[22],同时就抓好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并对其进行严格监督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制度规定。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明确强调和指出:“重点加强对高级干部、各级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完善领导班子内部监督制度,破解对‘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难题。”^[23]可见,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贯高度重视并时刻紧盯各级领导班子及一把手这些“关键少数”的监督治理。通过“关键少数”的自我革命把住“关键重点”、做出一系

列相关制度安排,从而辐射和带动管党治党的全面从严。事实也证明,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整体态势基本形成,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大好局面也基本形成。

三、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镜鉴启示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之达成与第二个百年目标之开启及民族复兴中国梦的追逐,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必将面临全面从严和纵深推进的艰巨任务。梳理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百年演进历程,其根本目的与意义在于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化推进提供重要的镜鉴启示。

1. 坚持守正创新理念,不断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制度治党学说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演进历程呈现出来的第一个启示,就是始终坚持守正创新的制度治党理念,不断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制度治党学说,从而探索出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治党的发展道路。

一方面,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擎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大旗,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贯彻落实到制度治党整体性过程中。这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所独有的高度严格的组织纪律性与先进本色的组织目的性的优良传统,始终坚守着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一以贯之地注重党的制度建设的优良作风,始终注重从厚重的中国传统制度文化土壤中汲取丰富养料。同时针对百年来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等不同时代面临的任務,中国共产党又能充分借鉴吸收世界政党治理的有益经验与人类制度文明的优秀成果,与时俱进地将马克思主义制度治党学说推向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回望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由潜到显的概念演进史,中国共产党先是强调党的纪律约束,然后又明确提出要借助“党规”而“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再往后逐渐聚焦党的制度建设并要求更为重视“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24],最后到新时代“制度治党”概念的明确提出与习近平新时代制度治党学说的逐渐形成,清晰地呈现出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萌芽、开端、发展、完善的历史线条与演进逻辑。

另一方面,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党的章程为根本遵循,把制定与完善党章、维护和执行党章作为制度治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这表现在,一是坚持党章在制度治党中的统帅性地位。在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所凭借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中,党章是规约党内关系与全体党员的“宪法”和总章程,是具有最高地位的根本大法,也是制定其他党内法规制度的“上位法”和总依据,由此便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中“党章至上”统帅性地位与根本制度遵循的确立,以及这种统帅指导地位被深深地贯穿于党内法规制度的“立改废”等各个方面的制度总布局。二是把修订完善党章作为制度治党的重要内容。作为体现权威性、先进性和科学性价值的党章,不在于它的一成不变性,而在于它的与时俱进性。换言之,随着时代的发展演进,党章本身也应该与时俱进地进行修订与完善。事实上,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根据自身所面临的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先后18次对党章进行相应修改,这其中,虽偶有少数几次的失败教训,如“文革”中召开的中共“九大”上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就给党和国家事业带来冲击与损失,但总体上绝大多数次的党章修订工作都是成功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党章修订工作,既正确地反映了党的建设工作的新变化、新理论和新成果,也极大地推动了百年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立改废”及与时俱进,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党的自身建设以及党和国家事业的快速发展。

2. 坚持党的领导原则,为增强制度治党实效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

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百年历程呈现出来的第二个启示,就在于坚持党的核心领导地位是原则前提。只有坚持党的核心领导地位,才能进一步推动制度治党的落地生效,也才能进一步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的新发展。

(1) 坚持在党的领导原则前提下的制度治党,有利于“围绕核心、服务大局”,从而为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障。马克思主义制度治党学说要求必须致力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及其权威,必须注重党的领导能力建设。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回顾和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25]。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

的百年历程,昭示着要特别重视领导核心和权威建设。毛泽东提出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很重要,要建立领导核心”^[26],邓小平也特别强调“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18]。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提出,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百年历程的实践总结与经验启示,也为推进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化取得显著实效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

(2) 坚持党的领导原则前提下的制度治党,有利于“加强供给、强化执行”,从而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目标与方向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党的百年历史表明,中国的事情在党,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必须依靠制度治党。新时代制度治党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解决“依何而治”,那就是通过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不断提供优质的制度供给和制度遵循。二是要解决“治理什么”,即解决治理对象是什么的问题,新时代制度治党把党组织、党员、党内政治文化以及党内政治生活当作治理对象,主要目的就是实现党组织建设、规范党员行为、培育党内良好政治文化以及推进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三是解决“如何治理”,主要途径是注重刚柔并济、系统配套、协同推进的方式和手段,将制度治党与思想建党紧密结合并推动二者同向同时发力,将制度治党与依法治国相结合并推进法治精神和法制权威的政党治理实践,强化制度执行与监督保障作用的发挥。

3. 坚持中国问题导向,立足中国社会发展实际与时代特征解决突出矛盾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国情不同,时代不同,都会产生属于特定国家、民族和时代的特殊矛盾和问题。坚持中国问题导向、“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27],立足中国社会发展实际解决突出矛盾与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辩证法的一个基本理论规定,也是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百年历程呈现出来的一个重要启示。

(1) 历史地看,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革命纲领、发动工农运动,实行国共合作、掀起大革命高潮。此时的大部分党员都是来源于农民,小农意识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影响比较严重,这对党的事业发展十分不利,党的制

度建设工作侧重于组织纪律教育。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开展军事斗争,针对党组织过于软弱无力的状况,毛泽东提出了“党指挥枪”的思想并确立了“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28]。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克服党内分散主义的不良倾向,开始重视党内制度的规约作用,先后做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抗日根据地领导一元化的决定、关于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的指示、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29]。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由局部执政转向全国执政,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展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较之以前有着显著的不同。改革开放后,制度治党的主要任务转向协调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上,并着手实行大规模的制度治党管党新举措,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新世纪轨道。

(2) 现实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新使命新问题的现实国情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提出了许多新要求,也必然决定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具有一些较之以往不同的新特质。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时代使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这个“伟大梦想”,需要借助党的建设这个“伟大工程”。其中,由于党的制度建设又是贯穿于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建设及推进反腐败斗争全过程的重点工作,这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进一步强化制度治党的思想与实践。此外,又由于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代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且极为复杂的严峻挑战,故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来推进党的制度建设,不仅将前期探索实践中所积累的宝贵经验总结上升为党内的法规与制度,而且注重对已有的党内法规制度进行优化、调整、完善和落实。正如习近平所说:“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要搞好配套衔接,做到彼此呼应……要增强制度执行力,制度执行到人到事。”^[30]诚如上述,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在其百年演进历程中,都是围绕各个不同时期的中国具体问题与时代任务使命而展开,既具有十

分明确的针对性与靶向性,又留下了一条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和教科书。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百年演进历程,就是党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用法规制度管党治党以确保党的先进性和长期执政地位的历史见证,也是党始终牢记并努力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使命的历史见证。只有不忘来时路,才能走向新未来。新时代新阶段新格局,新征程新使命新目标,作为百年大党的中国共产党,面对当今世情、国情、民情、党情的深刻复杂变化,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重点把握和明确强化制度治党的立论逻辑,认真梳理与总结回顾建党以来关于制度治党的百年演进历程与丰富历史经验,通过坚持守正创新理念、坚持党的领导原则、坚持中国问题导向,不断将新时代制度治党推向纵深发展。

参考文献:

- [1] 王沪宁.政治的逻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334;335.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4.
- [3]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43.
- [4] 李长龙.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化推进的三重逻辑[J].长白学刊,2020(3):38-42.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6.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13.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519.
- [8]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5;155.
- [9] 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下)[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61.
- [10]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344;10.
- [11] 刘红凇.《政党法》的世界概况与主要成因[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1):117-121.
- [12] 何包钢.民主理论:困境和出路[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4;4;12.
- [13]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8.
- [14]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764;750.
- [15]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121;318.
- [16]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08;331-332;147;326.
- [17]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249.
- [18]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77;310.
- [19] 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10.
- [20] 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59-60;81;94.
- [21] 崔耀中.不忘初心 走向复兴:新时代新思想新征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232.
- [2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187.
- [23]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40-41.
- [24] 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15.
-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00.
- [26] 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69.
- [27] 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07.
- [28] 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88.
- [29] 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27.
- [30]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8.

责任编辑:曾凡盛